

周恩来教育思想的辩证观述论

李江源 潘后杰

内容提要 当今教育改革与发展,必须处理好教育内、外部的各种关系。周恩来正是一位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者,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贯穿在他所有的教育论述与实践。这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更是我们教育工作者应学习、研究、继承和发扬的宝贵遗产。本文试从周恩来关于教育与政治、经济及教育内部诸种关系等几方面的辩证思想进行讨论。

关键词 周恩来 教育 政治 经济 辩证思想

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一个坚持实事求是和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人,必然要求自己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联系地而不是孤立地、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看待一切客观事物,进而分析客观存在着的一切矛盾,并找出解决矛盾的办法,找出事物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规律。周恩来正是这样一位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者,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贯穿在他所有的教育论述和实践中。这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更是我国教育工作者应当学习、研究、继承和发扬的宝贵遗产。

一 关于教育与政治的关系

教育与政治的密切联系,一方面表现为政治对教育具有直接的重大影响,政治直接影响教育领导权,统治阶级的政治观点、政治目的直接影响教育的政治方向;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教育具有政治功能,向受教育者灌输一定社会

的政治思想意识,以形成他们适应一定社会政治制度和参与一定政治活动的政治素质。正如周恩来所说:“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并且是为这种政治和经济服务的。”^[1]这里虽然说的是文化,但也适用于教育。

教育具有重要的政治职能,当教育的这方面职能与当时的社会政治制度相适应时,则起着维护和发展这种政治制度的作用;当教育的这方面职能与当时的社会政治制度相悖时,则将危及或破坏这一政治制度的稳定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内涵就演变为:教育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用来改造旧社会、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战线。周恩来在建国初期就提出“我们必须在教育观念上来一个改变”^[2],反复提出“为工农开门”的思想。这是因为“新中国的教育与旧中国的教育根本不同,必须反映社会主义的新政治、新经济,必须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3]。要把只为极少数人服务的教育改

造成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教育。周恩来认为,首先“要对接收过来的旧教育作根本性质的改革”^[4]。另一方面,他又要求对旧教育采取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既有否定,又有肯定。他说:“我们要承认这个事实,资产阶级教育总给了我们一些知识,也使我们获得了一些组织能力,这对我们是有帮助的。”“受到资产阶级教育,不能光说不好,它对我也有启发。这样说才全面一点。”^[5]对旧教育的某些合理部分要肯定,否则也是一种偏差。这种科学的分析态度和方法同样适用于认识外国教育。他说:“反对帝国主义文化,是不是说欧美的文化就一无可取之处了呢?不是的。”“我们对欧美文化的态度,是否定其反动的东西,同时吸收好的东西,为我们所用。”^[6]今天,我们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也应持这种一分为二的科学态度。周恩来就是这样辩证地认识教育与政治的关系的。

二 关于教育与经济的关系

经济是基础,有什么样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就有什么样的教育。经济的发展,往往制约着教育的发展,一个国家教育的发展水平是其经济发展水平的反映。因此,既要看到经济对教育的制约、影响和决定作用,又要重视教育反过来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影响和决定作用。在一个经济文化底子薄、基础差、相对落后而经济又刚刚起步的国家尤显重要。周恩来正是这样来看待经济、教育的相互关系的。

新中国建立初期,百废待兴,面临着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等各项艰巨任务。这时,周恩来既看到经济力量薄弱对发展教育不利的一面,又看到发展教育对经济的巨大推动作用。他抓住了教育落后、人才不足这个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和主要矛盾,一再强调人才的决定性意义和培养人才的作用。1951年8月,他在一些专业会议代表及政府各部门负责同志参

加的会议上指出:“人才缺乏,已成为我们各项建设中的一个最困难的问题。不论在经济建设,国防建设,还是在巩固政权方面,我们都需要人才。”^[7]1952年10月,他在政务院第156次政务会议讨论文化教育工作时指出:“我国要建设,干部、人才就成为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其它条件都具备,缺乏干部、人才也是不行的。”^[8]并且还提出了一个重要主张,即不仅要使培养人才的教育工作与经济建设同步,而且要适度超前、优先发展,为国家建设提前准备好必需的人才。1953年秋,他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说:“培养大批的建设人才,是我们现在最中心的问题。”建设人才从何而来?他的方略是优先发展教育。他说:“今后教育事业要有很大的发展,我们对教育事业的投资要超过任何一个工业部门。过去,到底是工业救国还是教育救国,争论不休,我们是先来个政治救国,现在把工业与教育结合起来。”^[9]他还将经济建设与文化教育建设的关系形象地比喻为“好象一辆车子的两个轮子,相辅而行”。正是由于周恩来这样辩证地看待经济与教育的关系,在决策上、行动上给予教育切实的支持,从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我国教育事业在推动国家经济、科技及社会发展等方面,确实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三 关于教育改革和发展过程中诸方面的关系

教育不是孤立存在的,在外部,它要与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社会的发展相协调,相匹配;在内部,各级各类教育之间也要相互配合、相互支持。对教育内、外部的各种关系也要用辩证的方法来正确对待、处理。

1. 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的关系

在教育内部,一定要注意各级各类教育之间相互配合,相互支持的问题。首先是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关系问题。周恩来对此明确

指出:“要发展人民大众的教育,中小学教育的发展就是一个重要而艰巨的任务。这就要求大家眼光向下,从大学看到中学、小学。在落后的中小学教育的基础上,是不能把大学教育办好的。”^[10]60年代初,他曾批评了教育部门存在的只重视高等教育,不重视基础教育“大大、小小”倾向。基础教育是培养专门人才的奠基教育,没有高质量的基础教育,就不可能有高质量的高等教育。其次是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关系问题。50年代中期,我国人口大量增加,每年净增1500万。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后,一方面,各行各业急需大量中等技术人员和有文化的劳动者,另一方面,又有大批小学、初中毕业生不能升入高一级学校,得不到必要的专门技能的培训。到60年代以后问题更加严重,矛盾尤为突出。为此,周恩来1963年在对国家计委、教育部、劳动部等部门负责人的讲话中指出:“最近几年,全国每年进入小学的新生,约1500万人。这就是说,如按小学的学生计算,只有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能升到高等学校,绝大多数都要陆续就业。”^[11]“要解决好这些问题,光有普通中小学教育而没有职业教育是不行的,所以必须努力办好职业教育。”^[12]“近几年内,大中城市不宜发展过多的普通初中,主要发展职业学校。”^[13]他实际上已经提出了改变普通中学单一结构的思想。再次是成人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关系问题。除了培养未来劳动者的普通教育之外,还要重视对现有劳动者的培养、提高,努力办好提高现有劳动者素质的成人教育。全日制普通教育与业余成人教育是相互协调、相互沟通的关系。周恩来在建国初期就要求这两类教育协调一致地发展,共同承担起为国家培养建设人才的重任。他要求人们克服陈腐的教育观念,树立新的教育观。他说:“我们必须在观念上来一个改变。过去的传统是只

为青年人办学,只讲正规化,六七岁上小学,到大学毕业是二十来岁。不能设想二三十岁的人进小学,四十岁的人进大学。现在这种观念要改变过来。我们的学制也要适应成年人的学习要求,给他们受教育的机会。”^[14]并特别指出,成人教育,包括工农干部教育和各级各类业余教育“要与其它教育占同等重要的地位”,认为这是新中国新学制的特点之一。另外,师范教育与其他各类教育的关系问题。早在1953年12月,他就指出:“高等师范学校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影响中等教育,影响新中国青年一代的培养,间接影响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提高,也就影响国家培养建设干部的计划和国家建设计划的完成。”^[15]尽管这里主要指高等师范学校,但同样适用于一般师范教育。对于师范教育的发展,要采取“根据需要与可能,有计划、有准备地予以大力发展的方针”^[16]。他在有关的指示中着重强调以下两点,第一是师范教育必须大力发展,从培养师资的角度去为其他各类教育服务,即要从经费、设备、生源等方面保证师范教育适度超前发展;第二是要根据各类教育对师资的数量、规格、门类等多方面的需求,与其他教育协调一致地发展,努力做到师资供求平衡。

2. 教育与人口增长、就业等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土地改革,有效地遏止了农村经济贫困化的过程,人口死亡率持续下降,由1949年的20%下降到1957年的10.08%。1950年—1954年人口出生率均在37%以上,人口激增。我国人口猛增无疑给升学、就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他在1957年就指出:“全国人口每年平均净增2.3%到2.5%,也就是净增1300万到1500万人。一年增长的人相当于一个不很小的国家的人口。”^[17]我国每年进入小学的新生,约1500万人,其中只有1%到2%能升到高等学

校,绝大多数都要陆续就业,走上生产岗位。周恩来充分注意到了人口激增与升学、就业之间相互影响、制约的关系,以及这些问题对国家建设全局的影响。因此,他一再提出必须找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并正确处理好三者之间的矛盾。他提出首先要控制生育,把计划生育搞好,并作为一项伟大的事业、长期的任务来对待。他说:“怎样使我国人口能有计划地生育,这是一个伟大的事业。现在全国有七亿人口,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人口增长得很快,生产就跟不上,这是一个大问题。要使全社会都能够按照计划生育的要求,在世纪以内把人口纯增率控制到 1%,这就很了不起。总之,计划生育是一件长期的事情。”^[18]与此同时,他还要求大力发展各级各类教育,特别要注意对中等教育结构进行调整,除办好普通中小学外,还要大力办好中等职业教育,并在普通中小学里组织学生参加一定的生产劳动,开设劳动技能训练课,使大多数的中小学毕业生获得一些就业的技能。这既可以提高新一代劳动者的素质,又可以适当分流以减轻升学的压力。因此,他提出:“要解决好这些问题,光有普通中小学教育而没有职业教育是不行的,所以必须努力办好职业教育。”“总之,中小教育和职业教育很重要,计划生育,劳动就业和中小学教育,是互相关联着的。”^[19]在实际工作中,或者进行战略规划、政策制定时,必须把三者联系起来,全面规划,任何单打一的做法都是不能解决这些社会矛盾的。

3. 数量与质量、普及与提高、改革与稳妥的关系

数量与质量、普及与提高、坚持改革与步子稳妥是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必须妥善解决的矛盾。只有正确解决了这些矛盾,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才能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①数量与质量。周恩来认为,国家建设急

需大量人才,当然要多出人才去满足。没有与建设需求相吻合的人才量,建设就会受影响、受损失。但是,在数量增加的同时,一定要使质量能得到同步提高,否则会造成人、财、物的巨大浪费,带来负面影响,并引发新的矛盾。把数量与质量对立起来,片面强调某一方面,不利于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在数量发展的同时,周恩来尤其重视教育质量,他把保证教育质量、提高教育质量作为办教育必须遵循的方针加以强调。自 50 年代后期起,他多次向教育工作者提出:“你们要保证教育质量,提高教育质量。如果你们再不断地增加数量,那就会得到相反的结果,会降低质量,那就不是办教育的正确方针。希望你们特别注意教育质量,提高教育质量,这是我们目前的主要问题……今后一定要控制数量,保证质量,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20]

②普及与提高。周恩来指出:“教育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普及,一个是提高”^[21],二者不能偏废。一方面要大力普及教育,扫除文盲,提高全体国民的素质,使教育大众化;另一方面还要在普及的基础上发展中、高等专业教育,培养大批掌握现代科技知识,具有较高文化水准的人才。普及与提高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他认为,只有在办好基础教育的基础上,才能为高一级学校输送合格的新生,把高层次的教育办好;只有把高层次的教育办好了,才能为国家培养大批的优秀人才,才能为中小学提供更多更好的师资。

③坚持改革与步子稳妥。周恩来曾就文化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指出:“文化教育一方面是政治的先导,另一方面它的改造又要在经济、政治变革之后才能完成。所以文化教育既是‘先锋’,又是‘殿军’。”^[22]在教育的改革问题上坚持“先锋”与“殿军”的统一,是我国教育改革得以发展的关键所在。为充分发挥教

育的促进功能,首先要坚决改造只为少数人服务的特权教育,使之成为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大众教育,并对教育思想、制度、内容、方法进行全方位的改革。只有这样,教育才能起到“先锋”作用。“有改革条件而拖延着不改革是不对的,口头上同意改革而实际上不改革也是不对的。只有在客观情况确有困难或者主观上对情况了解不够时才可以等待,但是等待并不等于拖延”^[23]。同时,他又充分注意到教育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他反复强调“教育改革是比较长期的事,要有步骤地进行”,“教育改革不能漫无计划,兴之所至乱搞一气,要区别轻重缓急,分阶段有步骤地进行,在有些问题上要善于等待”。他举例说:“在唯物论与唯心论,无神论与有神论以及教学方法等问题上,不能急性地强迫人家同意你的意见。不然的话,表面上好象同意了,实际上并没有解决实际问题。”^[24]涉及教育工作者的思想认识问题、世界观问题,就应当等待他们的觉悟,千万不能性急,得有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

4. 教育方针问题上的一些矛盾关系

教育方针是教育工作的宏观指导思想,是总的教育方向、教育目的和教育政策。周恩来在论述我国教育方针时,对教育方针所涉及的一些矛盾关系进行了精辟的阐述。

①德、智、体、美的均衡发展。毛泽东提出的“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周恩来多少年来都是广为宣传倡导,深刻阐释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对教育方针颇有一些独到的论述,尤其强调德、智、体、美的均衡发展。他说:“我们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前进,每个人要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均衡发展。不均衡地发展,一定会有

缺陷,不仅影响个人能力的发挥,对国家也不利。”^[25]均衡发展是一个内涵异常丰富的教育概念。我们过去一直强调全面发展,但理解得并不算深刻、透彻,有些人在执行全面发展时搞成平均发展、统一刻板地要求学生。而周恩来在谈到全面发展的同时强调均衡发展,认为:“均衡发展是要思想和身体都健康。思想健康和身体健康是相互影响的。”^[26]这点对新中国的青年一代确是必不可少的要求。全面发展的方针,在贯彻实施的过程中一直存在不少问题。在单一的“应试教育”影响下,不少学校都只重视智育,而且是不完整的智育,只是追求学科分数,学生课业负担很重。对此,虽一再要求减轻,但收效甚微。这样,对学生的德育,体育就都放松了。因而思想健康和身体健康必然受到严重影响。至于思想健康和身体健康相互影响的观点更是令人回味,值得深入研讨。

②教育与生产劳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革命导师们在教育问题上的一个重要主张。但在我国自50年代中期起,由于“左”的思想大行其道,形而上学思潮甚嚣尘上,教育界深受其害。当时普遍认为:学生劳动越多越好,劳动越多,表示教育革命越坚决,立场越坚定,越有成效。其结果是走入了极端,劳动冲击了正常的教育教学工作,降低了教育质量,严重影响了师生的身体健康。周恩来发现这一苗头后,很快纠正了这种对教育方针片面的理解。他说:“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是主导方面,因为学生来学校就是为了学习。我们一定要认清主导方面,认清主导就没有方向,认清主导就没有重点。”^[27]他反复说明,学校要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但学校的主要任务是提高教育质量,为社会培养合格的人才;教师的主要任务是教书育人;学

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这是主导方面,千万不能丢。离开教育,片面强调生产劳动,并任其干扰教育教学活动,既不利于学生的学习,不利于教育质量的提高,同样也不利于国家的建设。此后,中共中央,国务院根据周恩来等人的意见,在 60 年代初期相继发布了《关于保证学生、教师身体健康的紧急通知》、《关于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劳动安排的几项规定》等文件,各地也根据具体情况制定了相应的条例,学校逐步恢复了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但好景不长,“文革”风暴席卷全国,学校成了“阶级斗争的主战场”,学生“停课闹革命”,无休无止的“学工学农学军,批判资产阶级”和师生下放劳动,给我国教育事业造成了巨大损失。

③红与专。50 年代后期,扩大化了的“反右派斗争”以及“大跃进”、“教育大革命”接踵而来,其中的“红专关系”是当时的一个热门话题。不“红”就是“白”,而所谓的“红”与“白”,又是根据某些人的主观标准,个人好恶而定,把人的政治思想状态静化、简单化、绝对化。如果被认定是“白”,那肯定是资产阶级,是“右派”。那些专心学习功课潜心向学的人,不管你政治上如何衷心拥护共产党,如何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都被说成“走白专道路”,都成为批判的对象。高喊政治口号,无心向学的人,甚至还有一些空头政治家,反而被认为是最革命的,是“红”的。

周恩来从一开始就对这些言论和做法进行了批判,他明确提出“红与专、论与史、文与道,都不能偏废”^[28],坚决反对片面强调某一方面。针对 60 年代初流行的“白专道路”,周恩来曾对什么叫“白”作了明确的界定,以避免借“白专道路”之名行伤害专心于科研本职工作的同志之实。他说:“一个人只要在社会主义土壤上专心致志为社会主义服务,虽然政治上学习得少,不能算‘白’。只有打起白旗,反

对社会主义,才是‘白’。例如有个外科医生,开刀开得很好,治好了很多病人,只是政治上不大开展,因此就说他是‘白专道路’,岂不是荒谬?”^[29] 60 年代中期,他在出访罗马尼亚时,在鼓励同学们学好外语,努力扩大知识面,学成后为祖国服务的同时,进一步指出:“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红与专的关系。你们到罗马尼亚来,不仅要学好罗语,学好专业知识,还要学好政治,做到又红又专。现在有一种‘红而不专’的倾向,这是不对的。红,一定要体现在完成党交给我们的学习任务上。……不然,就如毛主席说的‘空喊口号’,什么搞革命,搞建设,都是一句空话。但是‘专而不红’也是不对的。毛主席说政治是灵魂,你们一定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要站稳立场。”^[30]由此可见,他强调的是又红又专,红与专结合,既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又有为人民服务的真才实学。他绝不是只讲一点而不及其余,无疑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点论。

④理论与实际。理论联系实际,这是周恩来从建国初期就开始在教育界强调的方针。他对两者的关系,总是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去分析和阐述。他告诫教育工作者:“我们的教育不应该犯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错误,也不应该陷入没有理论指导的经验主义错误中去,这样才能使青年少走弯路,少碰钉子。这是教育者的责任。”^[31]对学校教育中实践应该多些或者少些的问题,教育界的看法不尽一致,有的人主张多一些,有的人主张少一些。对此问题,周恩来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为了速成,实践少一些是可以的,但是为了更好地掌握理论,还是要多去实践。学习理论需要反复实践,才能掌握得更准确,领会得更深刻。所以,忽视实践的一面,或者把理论和实践对立起来,都是不对的。”^[32]就高等学校理论与

实际一致的问题,周恩来也给予了精辟的论述。他明确提出,高等学校应当多学些理论知识,不能因为强调与实际结合就不去进行理论知识的教育和学习。“大学总是要学得广一点,深一点,理论更多一点”,不能“不适当地强调实践,忽视理论,把大学降低到专科学校的水平”,“那些认为大学不需要学比较高深理论的看法是不对的”^[33]。当然,我们大学所要学习的理论,是“经过实践检验了的理论,目的是要用它进一步指导实践,更好地为人民服务”^[34]。并强调指出:“全国高等学校都要重视实践,都要提高理论水平。”^[35]

⑤学习与身体。建国初期,我国的广大青少年学生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学习十分勤奋,刻苦,想掌握过硬的本领报效祖国。但随之而来的是大多数学生缺乏必要的休息和文娱活动时间,体质有所下降,在国外的留学生学习更是紧张。周恩来对此很关心,一再指出:“青年一代的健康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要求各地教育部门把工作重点放在减轻课程负担和减少社团活动方面。同时,他告诫学生要正确认识学习与身体的辩证关系,他很赞成毛泽东建国后不久提出的“健康第一”的方针。他认为学习固然重要,但健康的身体又是学习的前提条件,身体不健康,学习任务无法按质按量完成,那就只能空怀报国之志而徒唤奈何,甚至成为国家、人民的负担。

对于身体与意志的关系,周恩来不是机械地把他们看作前者决定后者的关系,而强调把身体锻炼与意志锻炼结合起来。他认为,身体固然是知识、道德的载体,但精神、意识又对身体具有反作用。因此,青少年学生不仅要锻炼身体,而且要重视意志的锻炼。他说:“我们不但要锻炼身体,还要锻炼意志,把这二者结合起来。有的人由于身体弱一点,工作精神,革命意志就衰退了,结果身体更衰弱了。这样,

身体影响精神,精神又反过来影响身体,交替循环地衰退下去,就可能变成革命队伍中落后的人。我们青年要有朝气,要有旺盛的斗志,要有顽强的工作精神,刻苦的学习精神和吃苦耐劳的精神。这样,就可以把我们的身体锻炼得更健康。”^[36]

四 与教育相关的一些其他问题

教育,作为一种精神活动,它从根本上要受制于政治、经济制度和生产力,但也要与其他各种形式的精神活动和思想形式发生很密切的联系。

1. 辩证地对待一些传统的道德观念

我国优秀的传统道德不但不应当否定,还应当赋予新的内容以使其发扬光大。周恩来曾说:“几千年间,劳动人民不断斗争,形成了一种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优良传统。我们应该继承这种传统,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扬光大。”^[37]即使在封建时代由统治者提出或被他们曲解过的那些传统道德观念,有许多也可加以改造,赋予新意。比如“孝”,在人类社会的初始阶段,本来是一种尊老养老的美德,但在封建社会,“孝”被转译成维护封建宗法制度的美德。正因为如此,新中国成立后,很多人讳言“孝”,一些人也不讲“孝道”了。周恩来却主张对“孝道”要辩证地看。1957年3月,他在杭州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说到赡养老人,我们有些青年团员也许会问:‘难道现在还要我们讲孝道?’对‘孝道’要做分析,要辩证地看。”“有否定,有肯定,这就是辩证法。如果我们当年不对封建家庭加以否定,不闹家庭革命,我们今天也就站不到这个地方了。可是革命成功了,现在就应有新的观念,对家庭要有所肯定。国家给了我们工资,我们能够对曾经养育过我们的老人,在他们丧失劳动能力后不去养活他们吗?当然不能。”^[38]这就是周恩来对待传统道德的辩证思想,弘扬“孝道”的思想

至今仍具现实意义。近些年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泛滥,有的人道德沦丧,遗弃老人,虐待老人的事时有发生,尊老、爱老、敬老、养老的观念有所淡化。在此形势下,重温周恩来对待传统道德观念的正确思想,实有别开新意之感。

2. 继承、借鉴与创造的辩证统一

周恩来不赞成一概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也不赞成一概否定外国的文化。他主张,在学习继承我国优秀文化遗产和外国能够为我所用的文化知识的同时,要把注意力主要放在今天的发展和自己的创造方面。学习、继承、借鉴的目的在于创造我们民族的新文化,在于推进中华民族的全面进步,在于为人类共同的文化宝库添中国文化之“砖”,加中国文化之“瓦”。这就要求我们在学习、继承、借鉴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发明,不能仅靠古人、外国人为生。他说:“我们对欧美文化的态度,是否定其反动的东西,同时吸收好的东西,为我们所用。……对封建主义文化也要先否定它,再批判地接受它好的东西。……我们还要反对官僚资本主义文化,要把它否定,再把一些有用的东西拿过来为我们所用。”^[39] 1951年9月,他在《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一文中,就继承、借鉴、创造三者的辩证关系作了透彻的阐述。他说:“我们要继承历史上有利于人民的传统,否定有害于人民的東西”。“我们承认普遍真理。科学技术不分国界,对于全人类都是有用的。……但是,我们要把这种知识应用到本国来,就一定要跟本国的实际相结合,不能勉强地生吞活剥地搬用。运用外国的知识首先要切合中国的实际,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来取舍,

有的能用,有的不能用;有的现在用,有的将来用。同时,我们还应该了解我们的民族的优点,把我们的历史的知识,民族的知识跟外国的知识结合起来。……我们要学习世界上先进的文化,但是我们要根据自己民族文化的特点,用我们民族的形式,进一步创造我们民族的灿烂文化。将来在共产主义的大家庭中,中华民族这一份文化财富,将会占很重要的地位。我们不要妄自菲薄,一讲起文化来,似乎一定要学外国。外国的文化只能做我们的参考,做我们的借鉴,不能代替我们的文化。……我们一定要有所创造,有所发展。”^[40] 他把继承和创新,学习、借鉴和发扬自力更生精神有机地结合起来,要求我们在学习前人和外国的时候,有所创新、有所发明,有所进步。

总之,周恩来在观察分析教育现象、处理教育问题、制定教育政策时,始终坚持唯物辩证法思想,他的教育主张、教育思想无不闪烁着辩证法思想的光辉。

注释

[1][2][3][4][5][6][7][8][10][11][12][13][14][15][16][17][19][20][22][23][24][27][30][31][32][33][34][35][36][37][38][39][40]《周恩来教育文选》,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151页、36页、151页、151页、186页、2页、34页、71页、3页、223页、224页、226页、36页、92页、93页、148页、227页、181页、11页、11页、11页、181页、229页、8页、9页、9页、9页、9页、221页、148页、147页、2页、6页。

[9][18][21]《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116页、570页、516页。

[25][26][28][29]《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129页、129页、342页、342页。